



追寻历史的真相

毛泽东与鲁迅

(修订本)

秋石◎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追寻历史的真相 毛泽东与鲁迅

(修订本)

秋石◎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秋石著.—2版
(修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ISBN 978-7-208-10547-8

I. ①追… II. ①秋… III. ①毛泽东(1893~1976)—
人物研究②鲁迅(1881~1936)—人物研究
IV. ①A755②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7744 号

责任编辑 曹勇庆
封面设计 傅惟本

追寻历史的真相(修订本)

——毛泽东与鲁迅

秋石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2.75 插页 8 字数 342,000

2012年3月第2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250

ISBN 978-7-208-10547-8/A·88

定价 48.00 元

自序：为历史做一份生动真实的证词

“为历史做一份生动真实的证词”，是已故著名文艺理论家贾植芳先生同我最初交往时语重心长的叮嘱。

我同已故著名文艺理论家贾植芳先生有着近十年的交往。他还不止一次地告诫我说：从事学术研究是一门苦差事，一是要耐得住寂寞，二是一定要坚持独立的观点和立场。

值得指出的是，早在追踪“毛罗对话”历史真相的早期阶段，我就直言不讳地将我正在进行的探寻进展情况及要达到的目的，告诉了贾植芳先生。我还斩钉截铁地表示：综合毛泽东四十年如一日发自内心对鲁迅先生的推崇，他不大可能说出诸如此类的话。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它搞个水落石出！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那么，以后就更不能搞清楚了。或许正是因了我的执著，或许是黄宗英女士的行文过于随意而令人难以信服，尽管在某些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并不那么相同，但贾植芳先生仍然满腔热情地支持我把这个问题搞出个结果来。尤其是在2006年9月，我在《作品与争鸣》杂志上发表质疑黄宗英女士文章的《“右下角一”，他不是罗稷南》的辩诬文字以后。当我告诉先生，那个“右下角一”，并非真的是罗稷南先生，而是与他同一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漆琪生教授时，他微微地点了点头。那一年金秋十月挂尾的一天，艳阳高照，已是九秩高龄的先生，一时来了精神，在家人的扶持下坐上了轮椅，领着我来到复旦大学邯郸校区路南，距其国顺路寓所七八百米远的步行街上。下了轮椅，他颤巍巍地拄着拐杖，一步一顿地，先是引导我参观了在复

旦学子心中颇具盛名的那家民营折扣书店。尔后，从书店出来，又轻车熟路地拐入设在书店斜对面的那个名叫“绍酒香”的假二层小酒楼，款待我喝了一通我的家乡酒绍兴加饭酒……

面对当前激烈动荡的世界格局，战祸遍地的中东、非洲、阿富汗，以及恐怖袭击和金融危机双重阴影笼罩下的某些西方国家，中国却是显得格外的稳定与和谐。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如同中流砥柱般矗立在东方！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值得自豪值得庆幸的。有一个稳定、和谐的生存、生活环境，比什么都重要。这也是我历时七年，自费5万余元，为搞清“毛罗对话”历史真相，不辞艰辛劳顿，不懈地进行调查考证的原动力所在。

长江东去，大浪淘沙，事物的本来面目存在于真实的历史之中。同样，本书面世后的备受各方关注与好评（据了解，一些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还结合本书，向学生讲授那段时期的历史，讲授治学之道），正是对十一年前贾植芳先生为我这个草根学者量身定制的“为历史做一份生动真实的证词”的著述原则，一次极具历史意义和现实主义的成功实践。

是为序。

附注：几经反复与斟酌，并在认真听取各方面人士特别是学界人士意见的基础上，最终我作出决定：由我自己为本书撰序。这是因为，没有人比我本人更清楚自己内心深处在想些什么：我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世界观及其信仰，我的为人为文原则，追踪“毛罗对话”历史真相的动机与目的，历时七年调查考证及成书过程中遭遇的艰辛、坎坷与其他，更有本书之内涵及深远影响力所在。毋庸置疑，今后撰书，我仍将奉行自己撰序这一原则。

秋石 辛卯年岁末

目 录

自序：为历史做一份生动真实的证词..... 1

上篇 追踪“毛罗对话”的历史真相

第一章 “亲聆者”还有多人在世 3

本书作者历经多年寻访证实：于黄宗英发表《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一文的2002年12月，还有其他九位历史现场见证人健在。这中间就有当初扶持黄宗英走红影坛的伯乐、著名电影导演陈鲤庭，今年102岁；以及被其呼之为大姐的亲密同事，著名戏剧、电影编剧王元美，今年98岁……

第二章 1957年7月7日晚：历史现场相与析 10

出席座谈会一个小圆桌一个小圆桌地围坐的其他35位人士，是否如同黄宗英所说的那样：事先早早被告知当晚毛泽东接见？她亲口指证的那个“右下角一”真的是罗稷南吗？会后，因被毛泽东一个回答“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的32岁孕妇黄宗英，是否真的如同她相隔45年后说的那样：请了“三四天”保胎假？她为什么只字不提毛泽东同她和赵丹之间的谈话内容？

第三章 毛泽东和蔼可亲：黄宗英等亲聆者说 51

1957年7月12日出版的《文汇报》，用一个半版的篇幅，以《和毛主席一次亲切的会见》为题，刊登了包括黄宗英在内的13位人士的发言内容，黄宗英在发言中说道：

我和赵丹在七·七晚上见过毛主席后,第二天一清早,就把这件大喜事告诉了我们的孩子,孩子也高兴极了,问我们:“毛主席为什么找你们谈话啊,你们是劳动模范吗?”我们听了很惭愧,我们对孩子说:“我们不是,是毛主席要我们好好工作,为人民做更多的事情。”毛主席的召见,对我们将永远是最有力的鼓舞,最严格的督促。

第四章 1957年:赵丹先生属于左派阵营 63

1957年的赵丹先生是一个背负着什么样命运的人?他的表现又如何?是否如黄宗英说的那样:1957年,赵丹一直陷身于新账旧账连着算的“风雨飘摇”中,不断地“挂钩上纲写检查”,如履薄冰,险些滑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深渊……

赵丹“与石挥他们合写的一篇文章”,究竟是怎样的一篇文章?

赵丹为什么能在反右斗争刚一收尾就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五章 关于“毛罗对话”等情况的通报 77

“毛罗对话”的真实内容是什么?

1957年7月7日晚上,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馆)咖啡厅座谈会上回答罗稷南的话,实际上,是其四个月前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同一话题多次讲话精神的重申。

第六章 与黄宗英商榷:此遗言,非彼遗言 82

附录1 参加1957年7月7日座谈会的各界人士简介 89

附录2 为历史瞬间留影的徐大刚先生 101

下篇 毛泽东与鲁迅

第一章 “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107

说到毛泽东的心是与鲁迅的心相通的这个经久不息的话题,有一个人的观察、体会尤为深刻。他就是深得鲁迅呵护与扶持,因鲁迅为之撰序的小说《八月的乡村》一举成名的萧军。在1944年3月22日写于延安的日记中,萧军这样写道:“鲁迅——对于中国国民性认识底深刻性、韧性,战斗的精神,严

肃性,深沉性,这和毛泽东底对中国社会、历史、政治人士的全面性……正是对照的。……鲁迅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正被毛泽东具体而实现了。他们底关系是宽与深,灵魂与肉体,一致的,相成的……”

第二章 在毛泽东和鲁迅之间架起桥梁 129

冯雪峰抵达中央苏区时,适逢毛泽东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排挤,被排除在中央领导核心之外……冯雪峰的到,令极具文人气质的毛泽东有了排遣心中郁闷的对象。毛泽东经常到冯雪峰的住处促膝长谈,话题最多,也是毛泽东最感兴趣的是鲁迅和鲁迅的作品。

一天,毛泽东又来到冯雪峰住处,开门见山,且十分风趣地提议道:“今晚我们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说地主恶霸,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

冯雪峰自1933年12月抵达中央苏区,到1934年10月与毛泽东一起跟随中央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短短十个月的时间里,他在毛泽东和鲁迅之间架起了一座相知相通的桥梁。

第三章 诗心相通 140

正因为毛泽东从根本上读懂了鲁迅,所以,毛泽东1961年在为鲁迅八十周年诞辰作诗时,真切地回顾了30年代上海文化战线上左翼力量与国民党反动派当局之间展开的这段“刀光剑影任翔旋”的斗争史。当年的鲁迅,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实施的异常残酷的文化“围剿”中,成为中国文化革命一代伟人的。鲁迅不仅推动了国统区左翼文学运动和中国文化革命的深入开展,还强有力地配合了共产党和红军在湘赣闽、鄂豫皖农村根据地对蒋介石军事“围剿”的斗争。因此,作为同一年代顽强、英勇地反击国民党军事“围剿”的领导人,毛泽东的感受是十分深刻的,对鲁迅的诗作自然也能产生共鸣,因而赞赏有加。

第四章 与鲁迅书长相随 160

毛泽东真正有意识地搜寻和阅读鲁迅的著作,是在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以后……设在延安的陕西省立第四中学,是全延安城唯一可以称得上是图书馆的地方。一天,闻讯而来的毛泽东在那里翻阅书籍时,突然发现有一批鲁迅著作的选本。喜出望外的毛泽东立马借走了三本回去仔细研读。几天后看完,他即让秘书退回,另外借了几本。到了第三次,他干脆让秘书把那里所有鲁迅著作的选本和单行本全部借了回来,供自己反复阅读。

一套由上海“复社”1938年出版的20卷《鲁迅全集》，后来被毛泽东完整无缺地从延安带到了西柏坡，又从西柏坡带进了中南海，直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在其所有卷集的篇章中，都留下了毛泽东阅读时留下的批注。

第五章 对“阿Q”的独特理解 173

毛泽东在同人谈话或写文章的时候，经常引用鲁迅的早期名典《阿Q正传》以阐述自己的见解。对《阿Q正传》及其《阿Q正传》的主人公阿Q，毛泽东也有着自己的独特的理解，其原因在于毛泽东对中国农民的本质有着入木三分的认识。

自1933年的井冈山时期起，毛泽东谈《阿Q正传》和阿Q，持续了三十三个头。

第六章 “圣人”和他的学生们 189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毛泽东：1937年10月19日于陕北公学《论鲁迅》

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毛泽东：1971年11月20日于接见武汉地区党政领导人的谈话

第七章 爱屋及乌扬鲁迅 272

战争年代，从延安到新四军及各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的领导人，对投奔革命而来的鲁迅学生，以及与鲁迅有过交往的文化人士，无不满腔热忱地给予接待与厚爱。丁玲如此，萧军如此，黄源如此。连曾与鲁迅发生过激烈论战的成仿吾，以及遭到过鲁迅痛批，一时间“走投无路”的徐懋庸，也都受到了应有的礼遇及妥善安排。当年在延安，仅萧军一人就收到了毛泽东给他的10封亲笔信函，还进行了数十次谈话。黄源临终前夕所云“在新四军，就像在鲁迅家中一样精神舒畅”的话，至今令笔者回味无穷。

附录 毛泽东与我国遗传学家谈家桢 324

备忘录：本书作者对“毛罗对话”的五次质疑与批评 330

后记：别了，东中街42号！ 332

上 篇

追踪“毛罗对话”的历史真相

1957年7月7日晚,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的座谈会中,真的说过如果鲁迅还活着,可能会把他关入大牢的话了吗?

长期工作在基层,业余从事左翼文学左翼作家研究的笔者,七年多来50余次自费前往上海寻访考查,先后发现除黄宗英这位自诩为可能是唯一在世的“亲聆者”外,还有九名存世的参加过那次座谈会的现场亲历者……

那么,就鲁迅这个话题,毛泽东究竟说了些什么呢?这个话题,在1957年毛泽东又论说了几回呢?是否只有罗稷南先生一个人提出过这个话题呢?为什么出席同一个座谈会的36位各界人士,包括那个令黄宗英“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提出惊天话题的翻译家罗稷南在内,竟然无一人成为右派?还有,在1957年间,被黄宗英时隔45年后反复渲染的所谓陷身于重重“风雨飘摇中”的赵丹先生,究竟是所谓右派?抑或是边缘地带的中右?还是立场坚定揭发了他人右派言行从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左派?

第一章

“亲聆者”还有多人在世

这段“毛罗对话”，我是现场见证人，但我也想不起还有哪位活着的人也听到这段对话。我打电话给我熟悉的律师：“如果我写出自己听到的这段对话，将与海婴所说的分量不同，因为我在现场；但是，如果没有第二个人说他也当场听到，那我岂非成了孤证？若有人提出异议，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证，那么在法律上……”那位律师说：“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责任写出来，留下来。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你看到、听到的事实写出来再说。于是我就到处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资料校正我的记忆，以期尽可能准确地表述这场短暂又撼人心魄的“对话”。

——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

摘自 2002 年 12 月 5 日《南方周末》C22 版

这段“毛罗对话”，我是现场见证人，但我也想不起有哪一位还活着的人也听到这段对话。我打电话给我熟悉的律师，简要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后，问他：“如果我写出自己听到这段对话，将与海婴所说的分量不同，因为我在现场；如果没有第二个人说他也当场听到，那我岂非成了孤证？若有人提出异议，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证，那么在法律上……”那位律师说：“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已大多不在人世，你就更应该把这件事写出来，留下来。这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涉及中国现代史的一段重要史实，你的责任和义务，就是把你所看到、听到的如实写出来，留待专家和后人去研究。”

——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①

摘自 2002 年 12 月 6 日《文汇读书周报》5 版

^① 为方便叙述起见，以下将《我亲聆毛泽东及罗稷南对话》一文简称为《亲聆》。

上述，是作为“现场见证人”的黄宗英和“我熟悉的律师”之间的一段对话内容。两文文字下方所标黑点，为引者所加，以示不同。这段对话内容十分精彩，其精彩之处在于他们将中国人固守了几千年的实事求是的传统法则，给硬生生地掰成了两截：法庭上，和法庭外。

笔者之所以将分别刊于《南方周末》和《文汇读书周报》上的这段对话内容，不厌其烦地一一重复列出，盖因其同一内容，但表述却有所不同。刊在《南方周末》上的，律师强调说：“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责任写出来，留下来。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你所看到、听到的事实写出来再说。”而仅仅相隔了一天——2002年12月6日《文汇读书周报》所刊的，则又变成了“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已大多不在人世，你就更应该把这件事写出来，留下来。这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涉及中国现代史的一段重要史实，你的责任和义务，就是把你所看到、听到的如实写出来，留待专家和后人去研究。”

黄宗英将这段对话内容均加注了“引号”，既然加注了引号，足以表明了这段对话的真实性及可靠性，而且是不可随意加以删改或作不同表述的，除非你声明前文表达不全或有误。然而，早在1965年就成为了上海市作家协会驻会专业作家的黄宗英却不加任何说明地作了改动，由前一日《南方周末》的“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改为了次日《文汇读书周报》的“如今已大多不在人世”的用语。这让读者读后，不免对她的文中内容的真实程度产生了怀疑。如同她在2002年的某一个时候，先是一脸郑重地告诉《南方周末》的取稿记者：你们《南方周末》影响大，敢讲真话，“由你们首发！”过不了几天，又对上海《文汇读书周报》编辑信誓旦旦地说：我授权“由你们和《炎黄春秋》同步首发——”；^①同时黄宗英还用龙飞凤舞的笔体（含签名）书写了本文题目，交给了《文汇读书周报》的取稿人员……

在黄宗英《亲聆》一文于“7月4日晚上写毕”之后，黄宗英电询“我熟悉的律师”。电话征询的结果是，如同5个月后她在《亲聆》一文中这样写道：

^① 见2002年11月29日《文汇读书周报》头版所发预告。

于是我就到处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资料校正我的记忆，以期尽可能准确地表述这场短暂而又撼人心魄的“对话”。

黄宗英“求助”了哪些人呢？是不是与她一起在1957年7月7日晚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与毛泽东亲切笑谈的36位各界人士中的某位成员呢？遗憾的是，黄宗英女士在其文章中并没有向我们举证出她向其他哪一位曾经出席过半个世纪后令她与当时并不在场而只是“听说”的鲁迅之子周海婴等人至今“心有余悸”的那次座谈会人求助的名字。

不过，有关黄宗英“求助”的人，黄宗英虽然没有在文中提及，但她还是向两位前来取稿的年轻人作了亲口叙述。在《南方周末》同一版面右侧的《听黄宗英说往事》一文中，方、齐二位取稿人向读者们作了这样的描述：

黄阿姨说，这篇文章能够拿出来，我给自己设了“五关”。……第五是文字关，7月4日晚上写毕，过了些日子我就把稿子交给了李普大哥（李普，新华社原副社长）。……我对李大哥说：“拙文若有语病、啰嗦、不妥之处，请放手删改、调整。”

请读者们注意了，黄宗英是将这篇“涉及中国现代史的一段重要史实”的文章全权授予李普先生“放手删改、调整”的。这就奇怪了，李普先生既非当年座谈会的出席者，亦非新华社采访这次座谈会的记者，他怎么可能因你黄宗英给予的“信任”，来充任对你的“亲聆”内容“放手删改、调整”这一重任呢？什么是妥，什么是不妥，李普先生根本无法定断，因为他并不是那次座谈会的当事者。如若李普先生真要是这样做的话，岂非是有删改、调整乃至造假历史的嫌疑了吗？

李普先生能给黄宗英女士把什么“关”？作为一个从事半个多世纪的新闻从业人员，他能把好这个他从来不曾莅临过的1957年7月7日晚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有毛泽东出席的座谈会的“关”吗？答案非常明确：不能！作为一名资深编辑，他至多只能就黄宗英文中的错字、别字和语法、逻辑等作些修改而已！至于“放手删改、调整”，李普先生是不具备这个资格的。

黄宗英还将稿子寄给了另一个人。这个人，黄宗英“亲聆”的文章中没有涉及，两位前来取稿的记者在《听黄宗英说往事》一文中同样没有涉及。个中缘由很简单，由于不是“亲聆”，那个人也是无法帮助她解决任何问题的。

这个人是黄宗英女士的浙江老乡。1957年7月7日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座谈会召开之时，这个人才17岁，还在老家上中学。有意思的是，2006年5月9日，上海、浙江有关部门联合举行的鲁迅学生黄源百年诞辰纪念会的前一日，这个人向人们笑谈了四年前他与黄宗英之间所经历的这一幕。聆听者有多位，笔者恰恰有幸与其紧挨着坐在一起并坦诚对话。他笑着告诉笔者：秋石，你有所不知，2002年黄宗英写好她那篇《亲聆》文章后，在没有交给《南方周末》和《文汇报》之前，还专门寄给了我一份，说是让我看看……

黄宗英的上述作为令人费解，她为什么不找一同出席当年座谈会的人去核证，而去找两个当年并不在会场的人员进行“删改、调整”或“把关”呢？由此不得不让人起疑，她信誓旦旦的那个“亲聆”之说究竟是不是“铁证”？或者换言之，是否真的是源自于毛泽东口中？

那么，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当年参加座谈会的36位“各界人士”，除黄宗英之外，是否均已不在人世了呢？

这个问题并不难搞清楚。单凭黄宗英在上海的名气和各方关系，要弄清楚这36位人士还有几位健在，并不需费太大的周折。可是黄宗英从撰写《亲聆》到公开发表以来的这么多年中，她从来不曾这么去做。这就更令笔者疑窦丛生：这又究竟是因为什么？

据笔者多次向上海有关方面有关人士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被告知：黄宗英于2002年12月发表此文时，参加1957年那次座谈会者尚有多人健在，而且神志并不糊涂。这就直接攻破了她《亲聆》一文中与律师对话时所云“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的这个判断。之所以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主观臆断，因为律师也好，黄宗英也好，既然能够花费大量时间“我就到处求助”，为什么不向其居住地及工作单位所在地的上海的方方面面打听一下？

读了这段即时即景（在2002年7月4日“病中”动笔撰写《亲聆》一文同一时间）发生的对话，让人迷惑不解的是：在向律师作这个咨询时，黄宗英为什么不先行认真地思索一番：这世上，除了“我”之外，参加那次谈话的还有哪一些

人活着？在打听清楚的基础上，哪怕是打听出一两个健在者后，是否还应当向活着的这一两个人印证一下，然后，再考虑如何发表的问题。等等。再有，从“我熟悉的律师”口中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那句“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的话，显然是顺着黄宗英的话头而来。“正因为”这三个字十分关键，表明了黄宗英本人首先是这样认知的——她应该是现今世上唯一“历史现场”健在者，自然是唯一能够证实“毛罗对话”内容真实与否的人。

确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许多人是相信了她所说的话的。何况，还有由她一手翻检出来，一脸欣喜地拥坐在毛泽东身边的那幅照片为证。

可也正是这段对话的内容，令笔者读后不由得疑窦丛生：作为著名演员和擅长报告文学写作的作家，又是在向世人讲述如此一件惊天动地、惊吓得导致自己“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的大事，怎么能够如此轻率地不作任何调查，向包括自己的导师与好友、当年的同事在内的同一个历史现场见证人征询一字半句，就武断地认定其他“当时在场的人……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呢？

不光是在落笔撰写文章之初，而且，于文章写毕的五个月后，《南方周末》甫一刊出，事情就起了明显的变化。原因十分简单——从前一日《南方周末》文中“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的表述，变成了第二天《文汇报读书周报》文中去掉“大概”二字的“如今已大多不在人世”的说法。显然，早在《亲聆》被《南方周末》记者拿去后的一段时间内，以及该文在《南方周末》发表的当日当晚，就有人（而且不在少数，且主要在“毛罗对话”的原发地上海，反响尤为强烈）为这个“大概”的表述纠正上了：明确告知，1957年7月7日晚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与黄宗英一道出席同毛泽东座谈的人士中，还有多人健在！

一个令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事实，也是七年多来笔者不懈地寻踪调查、考证的结果，却是板上钉钉地印证了七年前笔者头脑中一直挥之不去的这个疑惑：至2009年3月，在已知的仍健在的多位当时在场的人中，就有黄宗英的两位前辈同事、好友在内！

从2003年1月下旬开始，^①笔者开始了长达七年之久寻找参加过那次座

^① 黄宗英《亲聆》一文最早见诸于2002年12月5日报章，时笔者正有要事缠身；自2002年11月起至2003年1月上旬，97岁的鲁迅学生，也是半个世纪前因主演电影《武训传》有所牵连的赵丹等人的有力庇护者黄源先生，经历了由病危到告别人世的过程。为此，笔者多次赶赴杭州探视，并受（转下页）

谈会健在者的工作。及至笔者前往上海的最后一次寻找,经过近 50 次的寻踪问迹,总共寻觅到了黄宗英于撰写、发表《亲聆》一文时的 2002 年健在的“历史现场”见证人,除以“亲聆者”身份撰文自居的黄宗英本人,共计 9 人(36 位出席者中有 1 人情况不详)。

他们是——

2011 年仍健在的有 3 人:

1. 著名戏剧和电影导演、理论家陈鲤庭,现年 101 岁,现居上海;
2. 著名戏剧、电影编剧王元美,现年 97 岁,现居上海;
3. 原中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上海工商学院院长丁忱,现年 92 岁,现定居海外。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前二人是“亲聆者”黄宗英与其丈夫赵丹先生长期过从甚密的同事及好友。陈鲤庭先生还是扶掖她走红影坛的伯乐。

2008 年去世的有 3 人:

1. 著名遗传学家、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谈家桢,2008 年 11 月 1 日

(接上页)北京有关方面委托,自始至终地与其家属一起参与了治丧工作。其时,由于已多次拜读了《亲聆》一文,知悉黄宗英文中撰有当年黄源先生抚慰她的丈夫“阿丹”的精彩传神的内容。由于黄源先生如此庇护“阿丹”,同时由于自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到 1955 年 5 月,黄源先生被任命为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等职的缘故,故而在其逝世后一周的治丧工作中,笔者想曾与赵丹先生一起生活了三十年的黄宗英肯定会有唁电唁函或花圈以志哀,但是在海内外大量唁电唁函中,特别是上海戏剧电影界众多老艺术家的唁电唁函中,独不见黄宗英女士的片言只字。要知道,2003 年 1 月 2 日黄源先生逝世时,距黄宗英发表《亲聆》仅 28 天。

有关赵丹受于伶、黄源保护一事,黄宗英在《亲聆》一文中如是说:

“……好在当时有于伶同志上门来开导,而黄源同志更常与阿丹对坐,一根接一根抽烟,黄源制服前落满了烟灰,显然领导人的思想负担比我们还沉重呢。”

黄源先生在《黄源回忆录》一书中如是写道:“拍《武训传》是在华东文化部时期,但这是夏衍他们直接领导的,我没有参加他们的制作。《武训传》的影片出来后,在华东军政委员会放映过,我邀请了赵丹和编剧(孙瑜),同饶漱石一起看。饶漱石看过以后,他也没有说什么。我看过以后,觉得当时一个是武装斗争,一个是搞办学,戏里有这两方面的场面,觉得有一点改良主义,不是一个单纯的办学的片子。我们是从武装斗争出来的,深知办学本身当然是好;但是,要用办学来救国,来解放中国,像武训那样是不行的,而其教学内容又是宣传封建主义的。……”

问题出来后,我还是去找赵丹,他很紧张。我同赵丹的关系,也是这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就这个事情本身来说,夏衍为主,那时他到苏联去了,回来在北京写了一个检讨,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才回上海来的。当时胡乔木保护了我们。在上海于伶也掩护了一下。……我虽然没有参加,但我承担了责任。不过不像以后那样搞批斗等等,还保护了编剧、演员。”